

潘 荣 著

北洋军阀史论稿

BEIYANGJUNFASHILUNGAO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洋军阀史论稿

潘 荣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军阀史论稿/潘 荣 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03

ISBN 7-5034-1728-5

I. 北… II. 潘… III. 北洋军阀史-研究-文集 IV. 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1955 号

责任编辑:李春华

装帧设计:张建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利民印刷厂 11011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字 数:230 千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0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07 年 0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0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北洋军阀史论稿》序

2007年元旦,潘荣教授从天津来电话,说他有一本《北洋军阀史论稿》准备交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付梓。让我先睹,写一点意见。我知道,潘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就由导师李新先生安排编写《中华民国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若干章节。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在南开大学、天津教育学院和天津师范大学任教。除繁忙的教学工作外,依然倾心研究北洋军阀,并有几本北洋首脑人物传记问世。这次结集的文字,正是这二十多年研究的结晶。其中有述有论,以述为主;论虽少,都精到有新意,不同于流俗之见。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开端,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胜利结束,前后十六年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民国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应占何等地位?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说,20世纪头二十年,中国社会沉入“谷底”,1919年五四运动或1921年中共成立以后,才从“谷底”爬出来。据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唯一正确的结论。一是说,中国社会的“谷底”在于甲午、庚子、辛丑等殃及中华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的剧变。而1911年后的辛亥首义、“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诸役,则终止两千年帝王专制,肇民主共和之端,三民主义逐渐风弥华夏。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胜利,才从政治上和人事上为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有利的条件。1915年诞生的《新青年》杂志,其创办人陈独秀和最初的作者多半来自同盟会在日本的刊物《甲寅》的作者群。《新青年》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使反专制、反奴役、反

愚昧、反保守的新思想激荡于中国。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则由老同盟会员蔡元培为代表的新派人物所主持，他们在思想上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保持一致，又不断提高，日益升华。然后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有各色社会主义的传播，有共产党的孕育诞生，有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有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的合作，有国民革命军成功的北伐战争，终于埋葬北洋军阀黑暗统治。谁能说 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没有走出沉沦，走出“谷底”，开始跃向新生的起点呢？

袁世凯与北洋各派军阀执政时期，是中国社会由落后走向进步的一个过渡期。它是一个大拐点，内中又有若干小拐点。其间有反复，有曲折，有倒退，有复归，也有某些不可忽视的进步。苦辣酸甜，五光十色，历史本来如此，不可以简单化，不可以虚无化。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没有沉沦到殖民地。瞿秋白曾经写文章批评孙中山的“次殖民地”论；孙中山认为“次殖民地”连殖民地都不如，显然错了。对此胡绳晚年正确地指出：

所谓“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不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有半独立的性格。袁世凯自己将五月九日接受“二十一条”最后通牒这一日定为国耻日，要大家不忘国耻（陈按：“二十一条”事实上并未实行，北洋历届政府均未承认，亦为国际法所不容）。共产国际开始找过吴佩孚，以为他是进步的。吴确有爱国的一面。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也是因为不甘心当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对他不放心。这些都说明这一点。^①

“谷底”说之所以不完全正确，最要紧之处是它完全否定或者低估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功及其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历史意义。在一些人看来，说辛亥革命“失败”了，才能证明后来革命的“成功”

①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 7 页。

和“伟大”，而不懂得中国社会变革的艰巨性、长期性及由此决定的阶段性和继承性。推翻帝王专制，建立中华民国，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初步转型，把中国引向建设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起点，这就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胜利。而漫长的艰难的社会改造之路，需要后之来者一代接着一代披荆斩棘，奋力前行，不可能一蹴而就。后来的革命不管多么伟大，也只能是辛亥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后来的革命者也只能作为辛亥革命者的继承人载诸史册。这应当是他们的荣耀，而不意味任何的贬低。“谷底”论者不懂得这一点，至少有三个失误：首先低估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解决中华民族内部的巨大矛盾，使占总人口94%以上的四亿多汉族摆脱仅占总人口1-2%的少数民族数百年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凝聚，对振兴中华的意义；其次，低估了即使是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意义，而其实民主共和并非仅是形式而已。再次，低估了1912年至1920年间民族资本主义长足发展的意义。史载“官僚资本的发展在1911年以后就进入颓势，外国资本的发展也在1914年以后受挫，惟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全时期（陈按：指1894—1920年）平均发展速度为13.8%，还略高于外国资本的13.1%。这说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工业化希望之所在。”^①正如潘荣书中所写：“在共和形式下，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被认为天经地义，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得到普遍承认。历届民国政府的军政大权虽然掌握在封建军阀官僚手中，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往往被邀参政或议政。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的范围内，发表或推行过某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特别是在振兴实业、发展教育等方面，起过相当积极作用。”（潘荣《北洋社会发展趋势与北洋政府统治的特点》）

^① 许涤新、吴承明 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张謇尤具典型性。民初制定和颁布的经济法规,诸如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等,凡公司、工厂、商店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多专利,为过去所无。不过数年,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大企业家辈出,一时蔚为壮观,号称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主持制定和颁布这些经济法规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张謇深受后世褒扬的荣氏家族、郭氏兄弟、简氏兄弟、周学熙、孙多森、刘鸿生、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吴蕴初、周作民、钱新之、胡笔江、陈光甫、虞洽卿等工商金融业巨子,大半崛起于北洋时期。这些足以证明,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已然走出沉沦的“谷底”了。质而言之“北洋政府有落后、保守的一面,也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民主共和制度。现代大工业、现代教育、现代法制等,均初步出现于北洋时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张宪文教授在几年前《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一文所作出的这一分析,后来又写进他主持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绪论中。我以为这一论断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而“谷底”说,使人们看不清楚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潘荣的书,还论及北洋时期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比较具体地论述了袁世凯死后北洋直、皖、奉、晋及新直系孙传芳等各派系的形成、矛盾斗争。指出北洋派统治的鼎盛时期极其短暂,1916年6月段皖系当政后随即接连发生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影响全局的政治动乱标志着北洋派的统治已经开始衰落。而北洋派统治从开始衰落到消亡则持续十二年之久,中央政府始终不能稳定,轮流掌握北京政权的北洋各派系的统治周期不过三、四年。

第二,北洋时期的“乱”,主要是乱了北洋统治者。“乱”有四类。其一统治者倒行逆施而引发的政局动荡。例如,袁世凯刺死宋教仁导致“二次革命”;袁世凯帝制自为引发护国战争;张勋复辟引发平乱之役与孙中山南下护法等。其二,袁世凯死后,南北大

小军阀的割据和战争。这类动乱尤以直皖奉三大集团为争夺对北京政权的控制而发动的若干次战争为烈。其三,1917年8月至1925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政开府(其间两度中断),北洋政权发动讨伐和孙中山的北伐。其四,列强武装侵略与政治干涉而引发国内政局动荡,例如,日本政府逼迫袁世凯政府草签二十一条与日军入侵山东而引发的国内反日排日浪潮。

政治动乱、军阀混战往往与革命运动、革命战争相伴相随,交织一起,都会给人民带来痛苦。这是政治变革时代不可避免代价。动乱使北洋军阀无法建立严密有效的统治网络,从而为包括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在内的新思想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仅就文化思想领域而言,那些扫荡千年暮气,切实推动社会转型的文化伟人,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周树人、李守常,乃至新闻出版界巨子张季鸾、胡政之、王云五、张元济等,便足以令后人大书特书了。

第三,为了细化北洋统治分裂的过程,潘荣着重叙述了“府院之争”。除黎段府院之争,又提出冯段府院之争。已有的论著对后者多仅作为直皖战争的背景略加描述,迄今尚少有专题研究。冯段之争既可以与此前黎段之争作明白区分,又可以表现直皖派系的形成及两派矛盾斗争发展的阶段性。

第四,张勋复辟的外国后台是哪个国家?一般说德国是张勋的后台,但实际上德国在华势力当时多受制约已呈颓势。张勋的后台主要是日本,而此时日本军政当局对张勋复辟之举持反对立场,以其时机尚不成熟不予支持。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

历史发展过程,复杂而曲折。不应以事物的结局为坐标,即不应以“成王败寇”的陈旧观念和简单思维去考察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由种种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所构成,形成千姿百态的生动画卷。主要细节往往牵动全局,决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总体性评价。对北洋史的研究,若要超越和创新,把探索的触角

深向历史纵深,细节的还原是至关重要的。潘荣的书在这方面有所前进,但仍有强化的余地。也许这是所有研究者今后应当着力探索,并有可能取得令人欣喜成就的新起点。

陈铁健 2007 年元月 16 日写于京南

亦庄之静观居

自序

在自己多年来所写的关于北洋军阀史的文章即将结集出版之际,内心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惭愧、惶恐。

惭愧的是,成果少而且份量轻。我自1981年9月硕士论文答辩结束,即开始研习北洋军阀史,至今已超过25年了,有关成果除3本北洋军阀人物传记外,全部收拢于此,就这么十几篇文字。当然自1984年调离中国社科院近代研究所后,日常主要工作是教书。但从我的学术活动看,主要方向始终是北洋军阀史。

惶恐的是,自己至今也说不大清楚这些文字在学术(或学术史)上究竟有没有或有多大意义。自我感觉:《北洋社会发展趋势与北洋政府统治的特点》一文所提出的北洋时期中国社会走势问题尚未见有他人明确提出;其次有关文章对袁世凯死后北洋直皖奉晋及新直系孙传芳等各派系的形成、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等问题叙述比较细致,并明确指出北洋派统治的鼎盛时期极其短暂。1916年6月段皖系当政后随即接连发生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影响全局的政治动乱,标志着北洋派的统治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北洋统治从开始衰落到最后消亡则持续了一段时间,达12年之久,换句话说北洋统治是长期处于不断衰落之中。对北洋统治的特点,我在归纳、分析以往有关论述之后强调了两点:第一、北洋政权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第二、由于袁世凯败亡后北洋派即失去中心与权威,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在很多方面无法实行强有力的统治,以至由北洋各派军阀轮流掌控的中央政府的统治周期不过三、四年。

上述这些看法是否有些新意我以为不应以自我感觉为依据,而应当由读者们特别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同仁们来判断。老

实说,现在我怕的不是来自读者或同事们的批评,而是除了自己的学生没有其他读者,没有反响,没有同仁肯抽出一些时间阅读它并提出批评意见。收入本集的文章约有一半已公开发表过,但以往反响甚微。本人记忆,只有徐宗勉先生曾辗转托人要去《袁世凯死后北洋派与进步党的关系》一文,并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其他文章则基本上无人问津,这实在是令人有些难受的事情。

尽管我对本书的学术意义不敢有所期望,尽管我很害怕本书印出来以后无人理睬,但是把自己二十多年来在这个研究方向上所做的工作做一次阶段性的总结,起码对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还是有促进作用的。况且出书以后我还准备继续主动征求同行们的意见。

就以这几句话权且作为自序。

目 录

1. 北洋社会发展趋势与北洋政府统治的特点	(1)
2. 略论袁世凯	(16)
3. 袁世凯死后进步党人与北洋派的关系	(36)
4. 段皖系当政与北洋派的衰落	(46)
5. 黎段府院之争	(59)
6. 张勋复辟及其失败	(75)
7. 冯段府院之争	(105)
8.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的兴起	(127)
9. 阎锡山与晋系的形成	(136)
10. “五省联帅”孙传芳的崛起与失败	(144)
11. 孙中山徐树铮的交往与粤皖同盟的建立	(155)
12. 20 世纪 20 年代孙中山弃曹直联段皖的谋略——兼析护法阵营内部小孙派联直反皖的不同意见	(162)
13. 浙奉战后吴佩孚与张作霖的“合作”	(173)
14. 严修与徐世昌的交谊	(179)
15. 严复与严修的交谊	(186)

附录

一、冯玉祥与护国战争——兼析《我的生活》	(191)
二、征引主要文献分类目录	(215)

北洋社会发展趋势 与北洋政府统治的特点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李新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研讨如何把握北洋军阀的概念及其兴衰原因、历史分期等问题,笔者作为参加民国史编写的一个成员即开始思考有关北洋军阀史的宏观性问题。但至今笔者也没有形成与李新、彭明和来新夏等老一辈著名学者发表的意见有重大观点分歧的系统的个人见解。^① 现在仅就老一辈学者没有论及或我认为论述尚不够充分的问题谈两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北洋时期中国社会的走势

以往已有不少学者在论著中对 1912 年至 1928 年这十六年间(下文中的“北洋时期”、“民国初年”或“辛亥革命后”亦均指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状况予以概述。从近年发表的有关论著看,张宪文先生对北洋社会所作的概括比较系统并有一定代表性。张先生指出,“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仍面临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其一,帝国主义虽然遭受革命运动的打击,但其势力及影响仍然存在;其二,传统政治、传统文化思想,仍大量遗留,社会上不断掀起复旧风浪;其三,传统政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小生产方式造成的落后意识、保守观念、

^① 三位学者的意见分别见于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序言:北洋军阀的兴亡》,《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7 年;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 年 5-6 期;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绪论》,《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制约着人们的进步和对新事物的追求。北洋政权就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过渡性政权。这段时期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矛盾冲突的畸形政治形态,是新与旧、保守与进步、传统与现代混杂并消长反复的时期。它有落后、保守的一面,也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民主共和制度”。^① 我们认为,张先生这段概述的意义在于,以往的有关概述大多笼统讲“封建势力依然严重存在,而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等等,从内涵上与对辛亥革命之前晚清社会的概述无法加以区分。而实际上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状况已有很大不同。正如张先生所指出,这个时期帝国主义遭受革命运动的打击,“有落后、保守的一面,也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民主共和制度。现代大工业、现代教育、现代法制等,均初步出现于北洋时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指出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遭受到革命运动的打击是很必要的。而以往有关概述强调北洋时期“中国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则很不妥当,也与基本的历史事实不符。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辛亥革命后的七、八年世界政治形势十分混乱。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打击了西欧英、法、德和沙俄等老牌帝国主义。正是由于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间接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正是由于西欧英、法、德和沙俄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可以说这就是民国初年中国的殖民化程度并未加深,民族主义有所抬头,民族独立成为发展趋势的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主要原因。

从国内看,民国初年中国主要面临两个问题急需解决:一是日本竭力扩大对华侵略;二是袁世凯上台后倒行逆施图谋恢复帝制,在袁氏败亡后不久又出现了军阀的割据与战争。但是我们认为,

^① 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第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国内这两个主要问题未能从总体上造成中国殖民化程度加深,未能阻挡住中华民族走出“谷底”(九十年代张海鹏撰文提出,近代中国社会的“谷底”,“就在今世纪的头20年,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①本文借用了“谷底”这一说法。),转而向上发展的进程。

下面我们就民国初年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是否加深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动乱是否使中国社会进步停滞甚至倒退问题作一些具体分析。从1840年以来列强侵略中国的基本事实分析,中国近代的殖民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抵御列强侵略失败后,中国政府被迫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被迫割地、赔款,被迫设立租界(或租借地)等;其二,列强控制中国政治与经济,特别是对北京中央政府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等。而对照上述两方面的基本内容,有关“二十一条使中国殖民地化程度加深”,“洪宪帝制又把民国拉到前清”等说法显然似是而非。说1915年初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就进一步加深了实际上是把当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复苏后所产生的危机感与历史事实混为一谈。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当然就容易得出“沉沦”仍是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的主要趋势的认识。我们可以将1902年“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结果与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的具体情况 & 结果作大致的比较。1901年9月,清政府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西太后、光绪帝等流亡西安的惨状下,被迫与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及比利时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该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另有各省赔款2千多万两,合计赔款超过十亿两白银。为支付这笔巨额赔款,清政府加紧搜刮。中国社会经济加速衰败,中国人民的状况极其悲惨,

^①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2期。

沉沦至“谷底”。列强占领了京津地区,并在北京设立“使馆界”,实际是“国中之国”。按照条约的规定,清官吏须负责镇压人民的反帝活动。而满清皇族为维持既得利益,竟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此清政府彻底沦为帝国主义各国政府控制下(通过“公使团”)的“二级政府”。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袁世凯政府虽然并不能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控制,但与清末由满族亲贵控制的“二级政府”还是有区别的。1915年初,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当时,英、俄、法、德等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日本乘机扩张在华势力。1914年8月日本以对德国宣战为名,出兵山东,中国的胶州湾从德国转到日本手中。日本欲将侵占胶州湾等得到国际承认,遂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此时大体上已统一中国的袁世凯如没有家天下的打算,本可发动北洋将领对日本人表示强硬,以顶住日本的外交压力。但袁氏怀着帝制自为的私心,企图让给日本一些权利,以换取其对自己帝制自为的支持。在日方威胁利诱下,袁世凯忍气吞声与日人草签了所谓“条约”与“换文”。袁世凯的软弱自私使本人及其政府永蒙羞辱。但我们还应注意到事后袁政府又郑重声明,此项条约由日本最后通牒被迫签订。而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不承认其生效,并于1919年巴黎和会正式要求修改。所以当时的“中日条约”从国际法讲不能成立,从事实讲,也未执行。此外,我们还应从“二十一条”内容被透露以后,中国各阶层民众,特别是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所表现出的空前的爱国热忱中看到,民国以后广大民众,尤其是汉族知识青年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已经完全复苏,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至于袁世凯称帝的结果,则更是进一步证明,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族的民众们(特别是新型汉族知识分子及其团体)不仅不肯向满洲皇族跪拜,亦不肯向本族的封建余孽称臣。

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活力复苏,与昔日满清王朝统治时期已大不相同。我们不应低估推倒满清政府后国人民族意识国家意

识复苏在凝聚中华民族“人气”方面的巨大作用。我们无法设想，四亿多汉族人可以在少数满族贵族的统治下抵御外侮，复兴民族与国家。而革命后至少这个少数民族统治问题不存在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贵族政权，占中华民族人口 98 以上的民众从民族感情上认同以汉族为主体“五族共和”的新国家已不成问题。从世界历史加以考察，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主体民族地位的确立往往是保证这类国家民族精神发扬光大，政治安定、经济发展重要乃至决定的因素之一。我们认为，以往对辛亥革命推翻满族统治的意义估计还有所不足。满族贵族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尽管前期不应全盘否定，但这种统治在精神上严重地压抑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也是不征的事实。尽管满族内部也有阶级分化，满洲贵族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满族人。但在占中华民族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汉族人受到仅占人口百分之一、二的满族人严重压迫的情况下，民族关系是不可能和谐的。清代满汉矛盾不仅存在于上层，所有旗人，特别是满族人在入仕、俸禄、土地等方面均享有特权。满洲贵族更是高高在上牢牢把握国家大权。而满洲贵族统治后期，为维护极少数人的统治地位，严重损害全民族和国家利益，非去之不可，否则一切矛盾无从解决。辛亥革命的成功从根本上解决了数百年的满汉矛盾，使几亿汉族人在政治上精神上摆脱了少数民族统治特别是政治压迫的锁链，使中华民族主体民族——汉族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实在难以估量。“民族革命理应包括被统治民族觉醒并反对统治民族这方面的内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非是‘以排满为名’，而行‘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之实”。^①

尽管民国革命中诞生的宪政在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以后被损坏了。以往人们多认为民主共和制此后仅仅保留下了形式上的

^① 章开源《“排满”与民族运动》《近代史研究》1981 年 3 期。